

#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

庄德林<sup>1</sup>, 罗碧静<sup>1</sup>, 陈信康<sup>2</sup>

(1. 合肥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 合肥 230601; 2. 上海财经大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对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进行了界定, 构建了包括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和城市创新力 5 个维度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模型, 以及包括 44 个指标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体系, 并以香港、北京和上海等 10 个“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以及纽约、伦敦和巴黎等 5 个全球城市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对标测评。结果表明: 所选的 15 个样本城市可分为 4 个层级;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样本均未进入第一层级, 它们在城市创新力和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方面全面落后于第一层级城市; 北京和上海在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和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方面有较好表现, 但北京在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方面与上海存在明显差距, 而上海在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和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方面存在明显劣势。

**关键词:**功能性机构; 集聚能力; “一带一路”; 总部经济; 区位优势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980X(2018)03-0122-09

## 1 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经济与社会互联互通的深入发展, 处于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功能性机构的全球布局正呈加速态势<sup>[1]</sup>。功能性机构作为资本、人才、技术和信息等高端要素资源全球市场配置的主要载体, 其全球集聚与扩散已成为塑造和变革全球城市网络的主要推动力<sup>[2]</sup>。因此, 无论是纽约和东京等已崛起的全球城市, 还是北京、上海和首尔等崛起中的全球城市, 纷纷将发展总部经济、角逐功能性机构集聚的制高点作为经济转型升级和城市持续繁荣的核心战略<sup>[3-4]</sup>。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倡议, 自被正式提出以来得到了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热烈响应。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公开数据表明, 截至 2016 年底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 且有 4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跨国企业布局与迁移功能性机构提供了历史机遇, 而且将直接重塑中国本土城市体系和亚欧非城市体系。在此背景下, 对“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进行国际

对标研究, 可为中国节点城市的转型和升级、高端要素资源全球配置力的提升提供决策参考。

国内外学者关于功能性机构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总部集聚机理<sup>[5]</sup>、总部选址与迁移机理<sup>[6]</sup>和总部经济评价<sup>[7]</sup>等方面。虽然近年来少数学者对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在北美、澳大利亚等国家或地区城市的集聚演化格局进行了实证研究<sup>[8-9]</sup>。也有学者对中国城市的总部经济竞争力进行了评价<sup>[7]</sup>。但是, 限于数据难以获取等因素, 相关研究未将研发中心、营销中心和采购中心等更多跨国公司功能性机构的集聚纳入考虑范围内, 缺乏专门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体系, 且鲜有学者对城市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进行国际对标研究。鉴于此, 本研究在既有的城市总部经济竞争力评价成果的基础上, 整合影响功能性机构集聚和迁移的因素, 构建城市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体系, 并选取“一带一路”核心节点城市进行国际对标研究。

## 2 城市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模型构建

### 2.1 功能性机构的界定

功能性机构的概念是伴随着跨国公司在高端价

收稿日期: 2017-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网络资源拓展与功能性机构集聚发展战略研究”(15BGL210)

作者简介: 庄德林(1976—), 男, 山东青岛人, 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城市经济与管理; 罗碧静(1993—), 女, 河南商丘人, 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城市经济与管理; 陈信康(1952—), 男, 浙江奉化人,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城市经济与管理。

值链环节的全球拓展布局而逐渐进入政府决策和学术研究视野的,其外延范围一直在不断拓展。就中国而言,自1995年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布《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以来,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等省市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划,总部经济竞争的焦点从最初的外商投资性公司逐渐扩大到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目前学术研究中关于功能性机构的界定已从最初的跨国公司总部和地区性总部扩展到承担投资、研发、营销、采购、战略管理和运营管理等总部性活动的跨国公司机构<sup>[10]</sup>,从单纯的外资跨国公司功能性机构扩展到外资跨国公司功能性机构和本土跨国公司功能性机构并重<sup>[11]</sup>,从跨国公司的功能性机构扩展到国际组织的总部和地区总部<sup>[12]</sup>。因此,本研究认为:全球互联互通时代的功能性机构应采用扩展后的广义界定,即以投资或授权形式履行跨省以上区域范围内的投资、研发、营销、采购、物流、资金管理和运营管理等总部性职能的跨国企业机构或国际组织机构。

## 2.2 城市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模型

城市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是指城市通过满足功能性机构的发展需求,培育和留住本地功能性机构、吸引外来功能性机构入驻,并能持续而有效地发挥集聚效应的能力。对此,本研究认为应从三个层面理解:首先,城市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的核心是满足功能性机构发展需求的能力;其次,城市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强调的集聚对象应是内外并重的,而不应仅关注吸引外资或外来功能性机构入驻;最后,城市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的核心内涵应是集聚效应的充分性和可持续性。城市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受多种因素共同驱动。本文通过对影响功能性机构选址、集聚与迁移的重要因素进行归纳与整合,并结合功能性机构的界定和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的内涵,构建了包含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和城市创新力五个维度的城市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模型。后文将对每个维度的选择依据和构成进行简要阐述。

### 1) 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

战略资源既是城市竞逐全球城市网络资源配置枢纽中心地位的关键,也是引发功能性机构跨区域迁移与集聚的重要动因<sup>[13]</sup>。城市的战略资源主要包括市场吸引力、金融资源配置力、城市体系等级和城市声誉。其中,市场吸引力体现了城市及其腹地的市场规模,是跨国公司实现规模经济的基本前提,金融资源配置力体现了城市在世界金融领域的支配

力和影响力,这两大因素均是业界公认的影响功能性机构迁移与集聚的关键要素<sup>[14]</sup>。城市体系等级反映了城市获得政策优势、制度优势、信息优势和社会资本优势的能力——这是功能性机构集聚的异质性需求<sup>[15]</sup>。在“用脚投票”的全球互联互通时代,城市声誉是城市间争夺投资和高端人才等高流动性战略资源的有力武器,良好的城市声誉是简化功能性机构选址决策、降低选址风险和提升选址溢价的重要保障<sup>[16]</sup>。

### 2) 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

全球互联互通的深入发展推动了跨国公司功能性机构的区位选择与城市体系布局在全球空间上的互动耦合,处于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跨国公司的功能性机构往往倾向于向互联互通水平高的大城市集聚<sup>[15]</sup>。城市的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是城市交通运输和信息通讯发达程度的综合体现,可以提高跨国公司人员流动、技术传播和信息沟通的效率,进而有效降低空间距离引发的管理和协调成本<sup>[17]</sup>,还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和降低跨国企业间的交易成本<sup>[18]</sup>。本研究用全球交通便利度和全球信息沟通便利度反映城市的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

### 3) 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

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是影响功能性机构运营效率的东道国城市商业服务业、总部集聚经济和城市政府保障力等营商环境因素的综合体现。首先,功能性机构本身承担的投资、研发和运营管理等总部性职能的有效运转,依赖于咨询、会计、人力资源、广告和法律等多元化商业服务的支持,因此功能性机构倾向于在具有商业服务业优势的城市选址布局<sup>[19]</sup>。其次,总部集聚经济可以通过共享高素质劳动力池、技术匹配效应和知识外溢效应等达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目的<sup>[20]</sup>,因此总部性机构和企业家们的集聚程度也是吸引功能性机构入驻的重要因素。最后,业界普遍认同制度性因素是影响功能性机构选址布局的重要变量,功能性机构所在国家的企业开办便利程度、税负水平、通关便利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均影响功能性机构的盈利水平和运营效率<sup>[21]</sup>。

### 4) 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

跨国公司功能性机构的雇员往往是典型的知识型员工,也是各城市竞逐的高端专业人才,对城市的宜居性具有较高要求<sup>[22]</sup>。功能性机构的集聚与迁移往往伴随着高端人才的汇聚与迁移,需要良好的城市宜居环境提供生活保障。跨国公司功能性机构的雇员对生活宜居性的敏感性高于普通居民,其需求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既包括环境宜居度和公共服务丰裕性,也包括市内交通便利性和城市生

活成本可承受性<sup>[23]</sup>。环境宜居度是对城市生态环境和文化多样性的整体评价,反映的是对雇员高品质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公共服务丰裕度和交通便利性反映的是雇员基本生活品质保障力;生活成本是对雇员生活品质的一个经济性约束。

5)城市创新力。

随着全球经济由要素驱动和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全球布局正由制造业价值链向创新链发展变化<sup>[24]</sup>,创新联系正逐渐超越商品和资本而成为全球城市网络的主要联系基础,城市创新力对功能性机构集聚与迁移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城市创新力主要包括智力资本丰裕度和研发能力两个方面。智力资本丰裕度体现了城市高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处于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功能性机构均是知识密集型部门,高端人才是其主要生产要素和核心竞争力来源,因此智力资本丰裕度对功能性机构的集聚和迁移具有决定性影响<sup>[25]</sup>。城市研发能力主要包括城市的研发投入能力和研发产出水平,它们决定了城市在全球创新链上的角色和功能,既是功能性机构全球布局追寻的主要区位要素,也是功能性机构共享创新集聚效应的重要保障<sup>[26]</sup>。

### 3 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体系设计

#### 3.1 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模型,严格遵循综合性、创新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现实适用性等原则,借鉴现有的功能性机构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了包含 5 个维度、3 个层次、44 个指标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 3.2 样本城市

在样本城市的选取上,本文以同时有企业入围 2015 年“财富世界 500 强”和 2015 年“福布斯全球 500 强”为初次筛选标准,从中筛选出属于“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的城市,共得到 16 个可供评估的城市。进而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样本城市的代表性等,从中选取北京、上海、新加坡、香港、莫斯科、曼谷、吉隆坡、孟买、雅加达和伊斯坦布尔 10 个城市作为测评对象。由于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是公认的全球城市,首尔、北京和上海在亚洲是主要竞争性城市,同时它们都是总部经济发展的标杆城市,且长期占据“财富世界 500 强”和“福布斯全球 500 强”企业总部数量排行榜的前 6 位,因此本文将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和首尔 5 个城市作为对标研究对象。综上,本文选取北京、上海和新加坡等 10 个“一带一路”核心节点城市以及纽约等 5 个标杆城市共 15 个城市作为样本城市。

表 1 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	市场吸引力	城市地区生产总值
		母国地区生产总值
		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母国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金融资源配置力	金融中心竞争力
		金融市场成长性
	城市体系等级	城市行政能级
		全球城市网络中心性
	城市声誉	国际组织落户数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数量
国际会议举办量		
城市网络知名度		
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	全球交通便利度	国际航空客运量
		国际航空货运量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全球信息沟通便利度	城市宽带质量
福布斯排行榜媒体集团数量		
Alexa 网站 200 强数量		
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	商业服务业支持度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商业服务业就业比重
	总部集聚度	世界 500 强总部落户数
		福布斯亿万富豪集聚量
	城市政府保障力	开办企业便利度
		税收适宜度
通关便利度		
知识产权保护度		
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	环境宜居度	生态环境质量
		人文环境质量
	公共服务丰裕度	医疗设施质量
		生活设施保障度
		基础教育资源丰富度
	交通便利性	公共文化资源丰富度
		国内交通便利度
生活成本	市内通勤便利度	
	城市生活支出	
薪资购买力		
城市创新力	智力资本丰裕度	高等教育人口百分比
		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科研人员丰富度
		技术人员丰富度
	研发能力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产学研合作力度
		科技期刊论文发表量
专利授权量		

#### 3.3 评价方法

目前关于评价体系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类。鉴于本文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属于多指标综合评价,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作为评价方法。该方法是根据各项指标值之间的差异程度确定权重,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干扰,能够客观地反映各指标在综合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具体的计算公式与步骤采用学界

公认的公式和步骤,在此不再赘述。

### 3.4 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指标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城市的统计年鉴、城市所在国的国家统计年鉴和政府网站、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联合国数据库、福布斯网站、《财富》杂志网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Alexa网站、国际机场协会(Airport Council International)网站、国际协会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网站、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网站、泰晤士高等教育网站、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 Convention Association)网站、《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最佳城市排名和报告》(Best Cities Ranking and Report)、《全球人才指数报告》(The Global Talent Index Report)、《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统计报告》(ICCA Statistics Report)、《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lobal Power City Index)、《全球金融中心指数》(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全球创新指数》(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以及《对标全球城市竞争力》(Benchmarking Global City Competitiveness)和《机遇之都》(Cities of Opportunity)等研究报告。

## 4 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结果分析

### 4.1 总体评价结果分析

15个样本城市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第一,15个样本城市可分为4个层级,其中伦敦、纽约和巴黎3大全球城市位于第一层级,东京、香港、新加坡和首尔位于第二层级,北

京和上海位于第三层级,吉隆坡、莫斯科、伊斯坦布尔、曼谷、雅加达和孟买6个城市位于第四层级。第二,“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与欧美3大全球城市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伦敦、纽约和巴黎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稳居前3强,且占据了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和城市创新力4个维度的榜首位置。第三,香港和新加坡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位居前两位,且遥遥领先于其他“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并已呈现出与全球城市——东京并驾齐驱的态势。其中,香港在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维度上居15个样本城市中的第1位,在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和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两个维度上也进入了前3名。新加坡在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和城市创新力4个维度上有良好的表现。第四,北京和上海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分别位于第3位和第4位。虽然北京和上海的表现现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但是与欧美3大全球城市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其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分别仅为榜首城市伦敦的77.1%和69.7%。此外,北京和上海在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和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两个维度上有较好的表现,但是在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维度上的劣势明显。第五,吉隆坡、莫斯科、伊斯坦布尔和曼谷4个城市是“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具有较强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的节点城市,是“一带一路”沿线城市范围内中国城市的主要竞争性城市。它们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得分虽然低于北京和上海,但是整体差距不大。其中,吉隆坡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几乎与上海相当。

表2 15个样本城市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排名及得分

城市	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排名	分项排名(得分)				
		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	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	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	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	城市创新力
伦敦	1(87.61)	1(22.81)	3(10.22)	3(16.59)	2(21.72)	1(16.27)
纽约	2(84.47)	2(21.71)	4(10.18)	1(16.79)	4(20.10)	2(15.70)
巴黎	3(82.34)	5(20.42)	7(8.70)	4(16.42)	1(21.86)	4(14.94)
东京	4(78.30)	7(18.56)	5(9.92)	5(15.34)	3(20.20)	5(14.27)
香港	5(76.95)	3(20.86)	1(10.61)	2(16.76)	6(17.88)	9(10.83)
新加坡	6(74.62)	6(19.43)	8(8.45)	6(14.70)	5(18.30)	6(13.75)
首尔	7(71.09)	9(17.04)	9(8.41)	7(13.11)	7(16.90)	3(15.63)
北京	8(67.51)	4(20.47)	2(10.30)	8(12.48)	13(13.18)	7(11.08)
上海	9(61.07)	8(17.65)	6(9.06)	13(9.64)	10(13.75)	8(10.97)
吉隆坡	10(59.37)	10(16.49)	11(6.85)	10(11.16)	9(14.93)	10(9.95)
莫斯科	11(57.01)	15(12.64)	12(6.70)	9(11.40)	8(16.42)	11(9.85)
伊斯坦布尔	12(53.11)	13(14.93)	13(6.51)	12(9.76)	12(13.48)	12(8.44)
曼谷	13(52.66)	14(13.78)	10(6.93)	11(9.89)	11(13.72)	13(8.34)
雅加达	14(48.62)	12(15.01)	14(6.46)	14(8.34)	14(11.42)	15(7.39)
孟买	15(45.26)	11(15.23)	15(6.19)	15(7.27)	15(9.10)	14(7.47)

#### 4.2 分项评价结果分析

第一,港京新沪的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表现优异,“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竞争力强劲。香港、北京、新加坡和上海 4 大城市的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不仅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位居前 4 位,而且在 15 个样本城市中也表现优异,分别位于第 3 位、第 4 位、第 6 位和第 8 位(见表 3)。虽然纽约和伦敦两大全球城市的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位居前两位,但是巴黎和东京两大全球城市的战略资源丰裕度却落后于香港和北京。首尔的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仅位于第 9 位,落后于中国的香港、北京和上海。这表明,“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对既有的全球城市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 1) 市场吸引力。

中国的 3 大城市——沪京港的市场吸引力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上海、北京和香港凭借自身以及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较高的经济增速而成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市场吸引力最强的 3 座城市,且在 15 个样本城市中均位居前 5 位。莫斯科的排名因为俄罗斯经济的低迷以及缓慢的城市增长率而在样本城市中垫底。

##### 2) 金融资源配置力。

新加坡和香港的金融资源配置力领跑“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京沪的金融资源配置力也表现出色。新加坡和香港在金融中心竞争力和金融市场成长性方面均有出色表现,其金融资源配置力在整个样本城市中仅次于纽约,分列第 2 位和第 3 位。上海和北京的金融资源配置力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分别位居第 4 位和第 5 位,也表现出色。莫斯科的金融资源配置力因其在金融市场成长性方面表现欠佳而在 15 个样本城市中垫底

##### 3) 城市体系等级。

香港和新加坡的城市体系等级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位居首位,京沪在城市体系等级维度上的表现各异。香港和新加坡的出色表现可归因于它们在政治上具有的超城市自主权和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心性上的优异表现。北京凭借大国首都的地位和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心性上的良好表现而位居城市体系等级排名的第 4 位。上海的行政能级低于众多首都城市,因此其城市体系等级位于第 12 位。

##### 4) 城市声誉。

北京的城市声誉领跑“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上海则与全球城市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北京凭借在 UNESCO 世界遗产数量、国际会议举办量和城市网络知名度三个方面的优异表现,其城市声誉位于第 3 位。由于上海在国际组织落户数量、UNESCO 世

界遗产数量、国际会议举办量和城市网络知名度 4 个方面全面落后于领先的巴黎和伦敦等全球城市,因此其城市声誉仅排在第 14 位。

表 3 15 个样本城市的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排名

城市	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排名	分项排名(得分)			
		市场吸引力	金融资源配置力	城市体系等级	城市声誉
伦敦	1	9(5.87)	4(4.10)	3(4.22)	2(8.62)
纽约	2	3(7.28)	1(4.66)	7(3.35)	4(6.42)
巴黎	5	12(5.03)	8(2.76)	4(3.54)	1(9.08)
东京	7	6(6.20)	5(3.50)	4(3.54)	9(5.31)
香港	3	5(6.71)	3(4.43)	1(4.41)	8(5.32)
新加坡	6	13(4.84)	2(4.48)	1(4.41)	6(5.70)
首尔	9	10(5.84)	10(2.61)	8(2.86)	5(5.72)
北京	4	2(7.79)	9(2.63)	4(3.54)	3(6.51)
上海	8	1(8.03)	7(2.81)	12(2.68)	14(4.14)
吉隆坡	10	8(5.90)	6(3.30)	8(2.86)	12(4.42)
莫斯科	15	15(3.70)	15(1.36)	8(2.86)	11(4.72)
伊斯坦布尔	13	11(5.35)	14(2.21)	14(2.00)	7(5.37)
曼谷	14	14(4.31)	11(2.52)	13(2.19)	10(4.76)
雅加达	12	7(6.14)	12(2.24)	8(2.86)	15(3.77)
孟买	11	4(6.82)	13(2.22)	14(2.00)	13(4.19)

第二,香港的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在样本城市中位居榜首,港京沪的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位居三甲。香港、北京和上海在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方面均有优异表现。其中:香港和北京的全互联互通保障力在 15 个样本城市中分别位于第 1 位和第 2 位,上海的全互联互通保障力位于第 6 位并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位居第 3 位(见表 4)。伦敦、纽约和东京的全互联互通保障力虽然低于香港和北京,但是也都进入了 15 个样本城市的前 5 名。巴黎的全互联互通保障力稍逊于上海,位居第 7 位。在港京沪以外的“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除了新加坡以外,其他均位居 15 个样本城市的末端。

##### 1) 全球交通便利度。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在全球交通便利度上的两极分化严重。其中:香港、上海和北京凭借在航空和航海运输方面的优异表现,其全球交通便利度在所有样本城市中位居前 3 位;而雅加达、吉隆坡、伊斯坦布尔、曼谷、孟买和莫斯科的全互联互通保障力则位居后 6 位。

##### 2) 全球信息沟通便利度。

整体而言,“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在全球信息沟通便利度方面与全球城市存在巨大差距。纽约、伦敦和东京 3 大城市的全互联互通保障力在所有样本城市中位居前 3 位,而“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仅北京进入了样本城市排名的前 5 位,其余 9 个城市依次排在

榜尾位置,其中香港和上海的全球交通便利度分别位居第7位和第12位。“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在全球信息沟通便利度上的全面落后,主要归因于它们在全球媒体资源控制力和全球网络信息控制力方面与领先

城市存在巨大差距。比如:上海没有媒体集团进入福布斯2000强,而纽约和伦敦则分别有9家和6家;在Alexa网站排名200强中,上海仅有1家企业入选,而北京和纽约则分别有23家和16家。

表4 15个样本城市的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和城市创新力排名

城市	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排名	分项排名(得分)		城市创新力排名	分项排名(得分)	
		全球交通便利度排名(得分)	全球信息沟通便利度排名(得分)		智力资本排名(得分)	研发能力排名(得分)
伦敦	3	6(4.50)	2(5.72)	1	1(8.57)	2(7.71)
纽约	4	9(3.76)	1(6.42)	2	3(8.25)	4(7.44)
巴黎	7	7(4.30)	6(4.40)	4	2(8.52)	6(6.41)
东京	5	5(4.86)	3(5.06)	5	5(6.62)	3(7.66)
香港	1	1(6.28)	7(4.34)	9	8(5.51)	10(5.32)
新加坡	8	4(5.24)	13(3.21)	6	6(6.58)	5(7.17)
首尔	9	8(3.94)	5(4.47)	3	4(7.89)	1(7.74)
北京	2	3(5.63)	4(4.67)	7	10(4.78)	7(6.30)
上海	6	2(5.85)	12(3.21)	8	9(5.36)	8(5.61)
吉隆坡	11	11(3.57)	11(3.28)	10	12(4.41)	9(5.54)
莫斯科	12	15(2.62)	8(4.07)	11	7(5.91)	12(3.94)
伊斯坦布尔	13	12(3.56)	14(2.95)	12	13(4.06)	11(4.37)
曼谷	10	13(3.30)	9(3.62)	13	11(4.49)	15(3.85)
雅加达	14	10(3.65)	15(2.81)	15	15(3.52)	14(3.87)
孟买	15	14(2.78)	10(3.41)	14	14(3.53)	13(3.94)

第三,“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城市创新力全面滞后,4大全球城市在此方面的优势明显。

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4大全球城市在城市创新力方面展现出明显的领先优势,它们的城市创新力全部进入前5名。而“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城市创新力则处于全面落后状态,没有城市进入前5名(见表4)。北京、上海和香港3个中国城市的城市创新力总体表现良好,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分别位列第2位至第4位,仅次于新加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首尔在城市创新力方面的表现突出,其城市创新力超越了巴黎和东京两大全球城市而位居第3位。

#### 1) 智力资本丰裕度。

全球城市在智力资本丰裕度方面的优势明显,而“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智力资本丰裕度全面落后。智力资本丰裕度排名前5位的样本城市为伦敦、巴黎、纽约、首尔和东京,新加坡、莫斯科和香港是“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智力资本丰裕度排序前三位的3个城市,上海和北京紧随其后。上海和北京的智力资本丰裕度与领先城市的主要差距体现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高等教育人口占比等方面。

2) 研发能力。在城市研发能力方面,首尔位居榜首,“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与榜首城市整体上存在明显差距。首尔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高达4.29%、百万人专利授权量为220.7件。它凭借这两方面的

出色表现在城市研发能力排名中位居榜首。伦敦、纽约和东京3大全球城市的智力资本丰裕度仍保持了强势表现,分列第2位、第3位和第4位。新加坡、北京和上海3个城市的智力资本丰裕度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位于前3位,表明其城市研发能力较强。其他“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产学研合作力度和专利授权量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从而导致了城市研发能力不足。

第四,港新京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优良,“一带一路”节点城市表现迥异。

#### 1) 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

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4大全球城市在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上依然具有强势表现,在前5名中占据了4席。其中,纽约的总部集聚度位居第1位,伦敦的商业服务业支持力度位居第1位(见表5)。香港在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维度的几个分项指标上都有出色表现。其中,香港的城市政府保障力在15个样本城市中位居第1位,且香港在商业服务业支持力度和总部集聚度方面也表现出与4大全球城市比肩的水准,因此它的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在15个样本城市中位居第2位。新加坡和北京两个城市在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方面也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前者与东京水平接近,后者与首尔旗鼓相当。然而,上海、雅加达和孟买在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上的总体表现差强人意,其得分分别仅为榜首

城市的 57.4%、49.7%和 43.3%。

表 5 15 个样本城市的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排名

城市	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排名	排名(得分)		
		商业服务业支持度	总部集聚度	城市政府保障力
伦敦	3	1(4.55)	7(3.14)	3(8.90)
纽约	1	3(4.33)	1(4.29)	5(8.18)
巴黎	4	2(4.52)	4(3.41)	4(8.49)
东京	5	5(4.17)	3(3.77)	7(7.40)
香港	2	4(4.20)	5(3.27)	1(9.30)
新加坡	6	7(3.70)	12(2.00)	2(9.00)
首尔	7	9(2.88)	10(2.34)	6(7.89)
北京	8	6(3.78)	2(4.27)	14(4.44)
上海	13	8(2.91)	11(2.11)	13(4.62)
吉隆坡	10	12(2.43)	13(1.95)	8(6.78)
莫斯科	9	10(2.85)	6(3.15)	10(5.40)
伊斯坦布尔	12	11(2.50)	15(1.93)	11(5.34)
曼谷	11	13(1.93)	9(2.36)	9(5.61)
雅加达	14	14(1.69)	13(1.95)	12(4.71)
孟买	15	15(1.33)	8(3.04)	15(2.90)

1) 商业服务业支持度。

全球城市在商业服务业支持度上的优势明显, 港京新沪则领跑“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 4 大全球城市都是商业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城市, 其中伦敦的商业服务业支持度位居榜首, 且 4 大全球城市占据了前 5 名中的 4 席。香港、北京、新加坡和上海已是服务业主导的城市, 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基本上都在 70% 以上, 它们都具有良好的商业服务业支持能力。曼谷、雅加达和孟买 3 个城市的商业服务业支持度位于榜尾位置, 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都在 50% 左右, 远低于港京新沪等“一带一路”领先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水平。

2) 总部集聚度。

全球城市的总部集聚度受到挑战,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总部集聚度整体表现良好。虽然纽约的总部集聚度仍位居榜首, 但是北京、香港和莫斯科已对 4 大全球城市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其中: 北京的总部集聚度已超越东京、巴黎和伦敦而位居第 2 位; 香港和莫斯科的总部集聚度也都超越了伦敦; 上海和新加坡虽然一直致力于发展总部经济, 且在引进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方面在全球都处于相对领先地位, 但是它们本土的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和富豪数量与领先城市相比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因此其总部集聚度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仅处于中间水准。

3) 城市政府保障力。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城市政府保障力表现迥异。香港和新加坡两个城市具有享誉世界的政府保

障力, 其城市政府保障力得分在 15 个样本城市中排名前 2 位。而伦敦、巴黎、纽约、首尔和东京 5 大城市的政府保障力也都具有非常高的水准, 依次排在第 3 位至第 7 位。其他“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城市政府保障力则与领先城市相比存在差距巨大, 其中上海和北京在开办企业便利度、税收适宜度、通关便利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具有全方位的差距。

第五, 全球城市在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在此方面全面落后。

巴黎、伦敦、东京和纽约 4 大全球城市在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它们的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在 15 个样本城市中位居前 4 名, 且伦敦和巴黎的环境宜居度和公共服务丰裕度分别位居榜首。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 香港和新加坡的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紧随 4 大全球城市之后, 分列第 5 位和第 6 位。而其他“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与榜首城市的差距非常明显。其中, 上海和北京的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在 15 个样本城市中分别排名第 10 位和第 13 位, 其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得分分别为榜首城市的 62.9% 和 60.3%。生活成本高居不下和市内通勤便利度低下是拉低其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排名的主要原因。

表 6 15 个样本城市的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排名

城市	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排名	排名(得分)			
		环境宜居度	公共服务丰裕度	交通便利性	生活成本
伦敦	2	1(5.01)	3(9.52)	3(3.91)	5(3.28)
纽约	4	4(3.85)	4(9.49)	7(3.15)	3(3.61)
巴黎	1	3(3.88)	1(10.17)	2(4.03)	2(3.78)
东京	3	5(3.83)	2(9.54)	5(3.78)	6(3.05)
香港	6	7(3.21)	6(8.18)	4(3.91)	12(2.58)
新加坡	5	2(4.30)	8(7.02)	1(4.59)	13(2.40)
首尔	7	6(3.24)	7(8.01)	8(2.91)	10(2.73)
北京	13	12(2.22)	10(6.60)	11(2.35)	15(2.01)
上海	10	11(2.25)	9(6.63)	9(2.80)	14(2.07)
吉隆坡	9	10(2.62)	12(5.81)	6(3.72)	9(2.78)
莫斯科	8	15(1.83)	5(8.39)	12(2.28)	1(3.94)
伊斯坦布尔	12	9(2.71)	13(5.01)	10(2.42)	4(3.33)
曼谷	11	8(2.80)	11(6.18)	15(1.71)	7(3.02)
雅加达	14	14(1.97)	14(4.67)	14(1.86)	8(2.91)
孟买	15	13(2.20)	15(2.25)	13(1.92)	11(2.73)

1) 环境宜居度。

全球城市的环境宜居度优势明显,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整体差距大。伦敦的环境宜居度高居榜首, 巴黎、纽约和伦敦 3 大城市的环境宜居度也均位列样本城市的前 5 名。新加坡和香港是“一带一路”

节点城市中环境宜居水平最高的两座城市。前者凭借在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方面的优异表现,在 15 个样本城市中排名第 2 位;后者排名第 7 位。由于上海和北京在生态环境方面的表现差强人意,因此其环境宜居度排名落后于曼谷、伊斯坦布尔和吉隆坡等城市,分别仅排在第 11 位和第 12 位。

#### 2) 公共服务丰裕度。

4 大全球城市的公共服务丰裕度优势明显,“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整体差距巨大。巴黎的公共服务丰裕度高居榜首。东京、伦敦和纽约的公共服务丰裕度则分列第 2 位、第 3 位和第 4 位。莫斯科和香港是“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公共服务丰裕度表现最好的两座城市,且它们的公共服务丰裕度与伦敦、纽约和东京的得分比较接近。北京和上海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表现不佳,它们的公共服务丰裕度不仅与巴黎相差甚远,即使与香港相比也还有不小的差距。榜尾城市孟买的公共服务严重匮乏,其公共服务丰裕度得分仅为巴黎的 22.1%。

#### 3) 交通便利性。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在交通便利性上的表现迥异。新加坡和香港在此方面具有突出表现:前者在 15 个样本城市中位居第 1;后者位居第 4 位。上海和北京在市内通勤便利度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因此其交通便利性在 15 个样本城市中位居中等偏下水平。曼谷在交通便利性方面的表现最差,其得分仅为榜首城市的 37.3%。

#### 4) 生活成本。

港沪京的生活成本高启,4 大全球城市在生活成本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根据美世咨询公司于 2015 年发布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调查结果,莫斯科的生活成本是 15 个样本城市中最低的。上海和北京的房价高启,且其薪资购买力与发达国家城市相比不具备优势,因此其生活成本排名垫底。

## 5 结论

功能性机构的全球布局与迁移正成为塑造和变革全球城市网络格局的主要推动力。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集聚功能性机构、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供了历史机遇。

本文对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进行了界定,构建了包括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和城市创新力五个维度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模型,以及包括 44 个指标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评价体系,并以香港、北京和上海等 10 个“一带一

路”节点城市以及纽约、伦敦和巴黎等 5 个全球城市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测评。结果显示:可将 15 个样本城市分为 4 个层级;伦敦、纽约和巴黎 3 大全球城市位居第一层级,北京和上海位居第三层级;“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与第一层级的 3 大全球城市相比存在明显差距;香港处于第二层级,其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稳居榜首,且在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功能性机构运营便利度和战略资源丰裕度 3 个维度上在 15 个样本城市中均居于前 3 名;北京和上海的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它们在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力和城市战略资源丰裕度两个维度上有较好表现,但是在功能性机构雇员生活宜居度维度上存在明显劣势;吉隆坡、莫斯科、伊斯坦布尔和曼谷等 4 个城市是“一带一路”范围内具备较强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的节点城市,也是中国城市在“一带一路”范围内的主要竞争性城市。

## 参考文献

- [1] 李玉梅,刘雪娇,杨立卓. 外商投资企业撤资:动因与影响机理——基于东部沿海 10 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2016(4):37-51.
- [2] 庄德林,杨羊,陈信康. 长江经济带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的特征——基于上市公司组织关系视角的分析[J]. 城市问题,2016(5):12-19.
- [3] STRAUSS-KAHN V, VIVES X. Why and where do headquarters move? [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2009, 39(2):168-186.
- [4] PAN F, XIA Y. Loca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headquarters of publicly listed firms within China's urban system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5(5):757-779.
- [5] DAVIS J C, HENDERSON J V. The agglomeration of headquarters [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2008, 38(5):445-460.
- [6] LAAMANEN T, TORSTILA S. Cross-border relocations of headquarters in Europ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2, 43(2):187-210.
- [7] 赵弘. 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2014—2015)[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348.
- [8] MURRAY D R. The urban geography of subsidiary headquarters in North America: explorations by sector and foreign linkage [J]. *Urban Geography*, 2010, 31(5):595-622.
- [9] TONTS M, TAYLOR M. The shifting geography of corporate headquarters in Australia: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J]. *Regional Studies*, 2013, 47(9):1507-1522.
- [10] 沈桂龙,张晓娣. 上海流量经济发展:必然趋势、现实状况与对策思路[J]. 上海经济研究,2016(8):3-18.
- [11] 江若尘,余典范,翟青,等.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上海总部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4):65-71.
- [12] 田素华,龚菲菲,唐东波. 双向直接投资发展与上海“四



- 个中心”建设的新动力[J]. 上海经济研究, 2015(3): 97-102.
- [13] 王凤彬, 杨阳. 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分化与整合——基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3(3): 148-171.
- [14] 楚天舒, 李晓红. 中国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水平动态综合评价[J]. 技术经济, 2015(10): 53-60.
- [15] 贺灿飞, 肖晓俊.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实证研究[J]. 地理学报, 2011(12): 1669-1681.
- [16] 庄德林, 伍翠园. 区域品牌化模型与绩效评估研究进展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4(9): 29-37.
- [17] 姚书杰. 我国台商投资大陆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技术经济, 2014(1): 104-109.
- [18] 曹湛, 彭震伟. 全球城市与全球城市—区域“属性与网络”的关联性——以上海和长三角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5): 1-11.
- [19] 余珮, 孙永平. 集聚效应对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1(1): 71-82.
- [20] 魏守华, 陈扬科, 陆思桦. 城市蔓延、多中心集聚与生产率[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8): 58-75.
- [21] 王永钦, 杜巨澜, 王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J]. 经济研究, 2014(12): 126-142.
- [22] 邓智团, 屠启宇. 创新型企业大都市区空间区位选择新趋势与决定——基于美国大都市区的实证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9): 10-15.
- [23] 吴波, 郝云宏. 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迁入地优势及其分异获取机理[J]. 南开管理评论, 2014(4): 46-55.
- [24] 戴翔, 张为付. 全球价值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外贸发展方式转变[J]. 经济学家, 2017(1): 39-46.
- [25] 余珮. 欧美跨国公司在华离岸研发的空间区位战略比较研究——基于城市层面集群网络的视角[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6(7): 98-112.
- [26] 祝影, 路光耀, 叶明确. 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空间演变与重心迁移[J]. 经济地理, 2016(9): 10-18.

## Evaluation on Agglomeration Capability of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in Node Cit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Zhuang Delin<sup>1</sup>, Luo Bijing<sup>1</sup>, Chen Xinkang<sup>2</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601, China; 2.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agglomeration capability of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model for agglomeration capability of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which contains five dimensions, namely strategic resources abundance of city, global connectivity, ease of doing business, livability quality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mployees and city'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t develop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cluding 44 indices. Then it uses this index system to evaluate the agglomeration capabilities of functional organizations of 15 sample cities including ten node cit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and five global cities leading headquarters economy.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fifteen sample citi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4 tiers, and none of node cit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are in the highest tier, and lag far behind the cities in the highest tier at the aspects of cit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livability quality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mployees; Beijing and Shanghai perform well in the fields of strategic resource abundance and global connectivity; however, Beijing is clearly behind in the field of livability quality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mployees, and Shanghai lags far behind in the field of ease of doing business and livability quality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mployees.

**Keywords:**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agglomeration capability; The Belt and Road; headquarters economy; location selection

(上接第 100 页)

##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ve Entry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s Municip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Li Lin<sup>1</sup>, Cheng Yuan<sup>1,2</sup>, Gao Jian<sup>1,2</sup>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 theory, this paper uses a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venture's innovative entry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is relationship, based on a national survey investigation in entrepreneurship.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innovative entry strateg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new venture's performance; lower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product market, factor market and legal effectiveness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venture's innovative entry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while intermediary service agencies negatively moderate the above relationship.

**Keywords:** entry strategy;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